

今文选

贰

社科卷

主编 刘斯奋
副主编 刘斯翰

编纂 刘卫国
陈淑梅

◎ 百年以来，我们的文化先辈在民族危亡之际，提出废止文言，推行白话，并身体力行，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他们的主张和行动得到社会广泛热烈的响应。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推行，可以说成果丰硕，佳作如林，异彩纷呈，蔚为大观，显示出我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这些经历史时间检验仍光芒不减，历久常新的文章，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这些文章所形成的个性突出，风格鲜明，生动活泼，要言不烦，一针见血的优良文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

主编 刘斯奋

副主编 刘斯翰

今文选

貳

社科卷

刘卫国
陈淑梅
编纂

选题策划 广东人文艺术研究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文选. 社科卷 / 刘斯奋, 刘斯翰主编; 刘卫国, 陈淑梅分册主编.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171-0887-0

I. ①今… II. ①刘… ②刘… ③刘… ④陈…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4387 号

责任编辑: 周汉飞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7.25 印张

字 数 318 千字

定 价 43.00 元 ISBN 978-7-5171-0887-0

《今文选》编纂委员会

主 任：刘斯奋

副主任：刘斯翰 徐南铁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虹昭 区 銛 刘斯奋 刘斯翰

刘卫国 张 均 张 维 陈永正

陈艳冰 陈淑梅 林亚杰 徐南铁

徐晋如 黄统荣 梁基永 谭运长

编纂出版助理：（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谧 叶 蓝 刘 晖 张呈前 谭树正

【总序】

2010年1月,刘斯奋、刘斯翰、陈志红、陈艳冰、金岱、徐南铁、蒋述卓、谭运长等八位广东学者,联名在《羊城晚报》和《粤海风》杂志上发表《岭南宣言——关于救治当前学风文风的呼吁》。

文如下:

文风腐败正在侵蚀民族文化的肌体!

拜金主义正在吞噬知识界的灵魂!

学统崩摧,文脉衰颓,已到了几难振拔的境地!

我等几名广东学人,秉承岭南先贤“学贵自得”、“学以致用”的精神,向全国思想界、学术界、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发出强烈呼吁:

挺身而出,端正学风,改造文风,担负起中华文化复兴的使命!

当前文风积弊之深重,可谓怵目寒心,兹举数端——

一曰以艰深文饰浅陋。一个可以简捷明白说出的意思,偏要故意弄得隐晦曲折;并无真知灼见,却满篇生搬硬套的外来名词术语,加上颠三倒四的“语法”,让读者头昏目眩,如坠五里雾中。这种“下决心不让人看懂”的文风,其影响之恶劣,为祸之巨烈,可谓亘古以来所仅见。

二曰以抄袭冒充研究。不去下苦功深入钻研,只从现成资料或别人的文章中东剪一段,西抄一节,改头换面,颠倒次序,拼凑起来,便堂而皇之地称为科研成果。一旦蒙混过关,名利到手,便窃幸得计,乐此不疲。为学如此,可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三曰以繁琐支撑空洞。将一个常识性的论题放大又放大,分割又分割,叠床架屋,堆砌引文,美其名曰:追根溯源,一网打尽。实则不过是借助大量杂碎材

料，以遮掩其判断力的匮乏和思想的空洞。打肿脸充胖子，借以吓人。

四曰以模式扼杀创造。把国外自然科学论文的若干规矩，变本加厉、生搬硬套到人文社会科学中来，形成固定格式。其可笑者，如规定论文引用文献的数量，其中又规定洋文献土文献各半，即可见一斑。按照这种模式，只要将一批现成的结论，加上一堆废话，像机械制造那样，填充到模具里去，就成了学术成果。在这种模式统制下，独创之见遭到扼杀，论述简明反受排斥。其荒谬悖理，较之古代科举八股文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曰以矫情代替真情，以低俗排挤高尚。明明对生活麻木不仁，远离老百姓痛痒，了无真情实感，却偏要故作深沉，发大感慨。不以真善美导乎先路，反以假恶丑颠倒众生。为吸引眼球，不惜肢解文法，灭裂文字。词语尘下，意识卑鄙。

弃起码之廉耻，视高尚为仇敌，有如污浊横流，是可忍，孰不可忍。

以上种种流毒深广的文风，实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任其泛滥，无数学人文士宝贵的生命和才智，将在伪学术、劣文学怪圈中被消磨殆尽，成为浑浑噩噩的牺牲品！

更有甚者——

将严重损害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使中华文化坠入虚妄、空洞、琐碎、矫饰、卑下的危险境地！

面对严重的危机，改造文风刻不容缓！

我们主张——

一、提倡经世致用，反对脱离实际。

二、提倡真知灼见，反对言之无物。

三、提倡真情高尚，反对矫情低俗。

四、提倡简洁明快，反对晦涩繁琐。

五、提倡精研独创，反对蹈袭拼凑。

自古以来，文章分“有用”之文和“无用”之文，我们并不一概反对“无用之文”，但即使“无用之文”，也应该切戒浮靡，作者要有起码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这样，文章的风骨和作者的自尊才有所依托。总之，为文必须认真、诚敬，决不苟且、敷衍。

态度决定一切，为文者态度认真、诚敬，文章就必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有真思想、真性情，文章便内容充实，令人读之感发兴起，如对良师益友。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为文当然需要文采，讲究修辞。但过分的枝蔓，既

遮蔽真情的表达,也妨碍读者的接受。特别在当前,更有必要提倡简洁明快,我们甚至宁可“裸奔”——素面朝天,至少真我还在!

当今文风败坏,根源在于见利忘义。当体制为一种文风提供利益的时候,便会自然而然形成一套可供投机取巧的模式,令大批学人文士身陷其中。

必须彻底打破这种“模式+量化”的评价体制。这一套体制,从根本上混淆了精神创造和物质生产的区别。流弊所及,使文坛混同名利场,学术变成“生意”,将泡沫视为繁荣,以数量取代质量。结果为伪学术、劣文学提供“有理合法”的土壤,使腐败文风得以大行其道。

改造文风,说到底还要从学人文士的人格修养入手。

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提倡“养气”。我们今天的文风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学人文士们泄了“气”。

孟子说“养吾浩然之气”,以达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华文明历千百劫而不断重生复振的气脉所系。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挑战,自身发生了重大调整,但是,中华文化的基本气脉不能断!知识界的责任与使命、尊严和自信不能丢!

噫戏!凡我有志之士,振作,集结,奋起!

以我们的浩然之气,支撑起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宣言》发表后,曾经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

如果说,《岭南宣言》是“破”,是对当下文风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并阐明自己的主张。那么,作为“立”的方面,我们觉得,还应当通过选文的方式,向全社会推荐优秀的语文范本,以推动良好文风的复归与发展。

事实上,百年以来,我们的文化先辈在民族危亡之际,提出废除文言,推行白话,并身体力行,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他们的主张和行动得到社会广泛热烈的响应。经过近百年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推行,可以说成果丰硕,佳作如林,异彩纷呈,蔚为大观,显示出我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这些经历时间检验仍光芒不减,历久常新的文章,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这些文章所形成的个性突出,风格鲜明,生动活泼,要言不烦,一针见血的优良文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

基于这样的认识,《今文选》的编纂,就是以近百年来白话文的成果为主要

对象,以内容充实,识见超卓,文笔严谨,辞情并茂作为入选标准,突出作品的独立审美价值。目的在于从文章写作的角度向读者展示百年以来,白话文运动在除文学创作之外的其他各种文体中,其发展的状况以及所达到的水平。同时,出于对近代以来中国文体的承传性和整体存在考虑,在选题中也顾及到同时期的文言文作品。

文章入选的范围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直到 20 世纪末的各类文体。共分十个类别:

1. 人文——人文学科如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评论文字。
2. 社科——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领域的评论文字。
3. 论争——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论战、争鸣文字。
4. 时评——著名报社、报人创作,对时事发表的社论、评论。
5. 译作——译介外国作品的篇什。
6. 艺谭——包括各艺术门类如美术、书法、音乐、电影等的艺术评论和漫谈。
7. 序跋——包括序言、导言、跋言、卷首语、后记等。
8. 品鉴——对收藏的艺术品进行欣赏、品评、记录、谈论的文字。
9. 近代政论——1840 年至 1919 年以前政治领域的有关论述,包括宣言、檄文等。
10. 今文言——为“现代文言文”,即“五四”以后的文言文。

至于文学作品(如小说、诗歌、剧本,等等),白话文运动以来无疑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是考虑到此前已出版过多种选本,因此不纳入本文选之列。

人编的选题按类分为十卷,主编刘斯奋、副主编刘斯翰。各卷编纂(按姓氏笔画排列)由王虹昭、区鈺、刘斯翰、刘卫国、张均、张维、陈永正、陈艳冰、陈淑梅、徐南铁、徐晋如、黄统荣、梁基永、谭运长诸先生以独自或联袂的方式分任。其他参与编选工作的人士,于各卷中分别标明。

《今文选》每卷内容的构成为:(1)前言,(2)入选文章,(3)作者简介,(4)文章评点。其中文章评点因文体特点、选家个性不同而各施其法,不作统一规范,以彰显自由活泼之文风。

百年之间所积累的文章数量异常巨大,要做到完整无缺地搜罗、通读,固然是不可能之事。即使是试图部分这样做,也远远超出我们的能力。因此,我们从来没有将近百年的好文章“一网打尽”的妄想,而充其量只能努力做到凡是收入本文选的,都必须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所谓“管窥蠡测”。倘能臻此目标

于万一，于愿已足。

当然，由于我们的眼光和水平所限，也由于文章之为物，从来就不存在可以“量化”的什么标准，再加上白话文本身还处于不断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对于什么是好文章，入选本文选的是否都是或者就是好文章？也肯定会有不同看法。那么，就姑且以此作为“引玉之砖”，以待更加成熟、完善的选本出现吧！

最后，还要对关心和支持过本书编纂的《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部、广东当代文艺研究所和天涯社区网站，表达我们的谢意。

刘斯奋 刘斯翰

2013年1月

◆ 社科卷 ◆

| 序 言 |

20 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沧海桑田的时代。社会变迁之迅速令人瞠目结舌,社会现象之多样又令人叹为观止。中国的社会科学在这样的时代产生,独特的历史语境给了中国社会科学独特的研究动力,丰富的社会现象给了中国社会科学丰富的研究资源。中国的社会科学从无到有,取得了极大的发展。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教育学等此前未有的学科,在这一世纪纷纷开门立户。在各门社会科学中,由于社会思潮的风起云涌,都涌现了自己的大师级人物和重量级成果。这一世纪所生产出来的社会科学研究文章,可以说是浩如烟海。

要将这一世纪的社科文章挑选出来,不同的选家肯定会有不同的选择。其间的差异显然源于选择标准。本书并不承担为中国社会科学建史的任务,用意不在用这些文章勾勒出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轨迹,本书作为《今文选》丛书中的一本,响应丛书的号召,以文风而不是文章在学科史中的地位作为选择标准。

说到文风,这里有必要对 20 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文章问题做一个简要的回顾与评述。

众所周知,文章有各种各样的风格,或雄壮、或纤弱、或华丽、或朴素、或简洁、或厚重、或清新、或沉稳。但就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不外两种文风:一种文风重视思想、重视见解,追求新意;一种文风重视学问、重视证据,追求严谨。中国学术界对这两种文风有特定的命名。前者名为宋学文风,后者名为汉学文风。

这两种文风各有所长,但也各有所弊。宋学文风重视义理、重视理论,强调

见解的新颖与高超,但其末流往往凭空臆造,游谈无根,摭拾虚辞以相夸煽,不惜抹杀甚至曲解证据。汉学文风长于求证,作风严谨,却短于风议,抽象思维有所欠缺,理论上的建树较少。不过,两相比较,宋学文风出问题的概率比汉学文风更大一些,问题的危害性也比汉学文风更为严重一些。

在这两种文风中,宋学文风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是有原因的。其一,20世纪中国的大势是求新求变。20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急需思想的解放,急需观念的更新,急需理论的突破。客观时势决定了中国社会科学必须重视思想、观念和理论。其二,有清二百多年,古文经学作为显学占据主导地位,其文风朴实严谨,即为汉学文风。但到晚清末年,今文经学兴起,喜谈义理之说,宋学文风已经在复兴之中。进入20世纪之后,启蒙主义和马列主义又相继传入中国,理论的作用被强调到非常的高度。启蒙主义认为,思想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马列主义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重视理论、重视思想的宋学文风因此成为时代主流。

应该说,在冲破思想束缚、开创学术研究新局面上,宋学文风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宋学文风的过度泛滥,也让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走了弯路,酿成危机。这种文风特别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就是搞学术研究凭的是思想,或者理论,而不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也不是辛辛苦苦、千锤百炼地搞论证,这种文风让人误以为学术研究就是理论先行,以论带史,而不是实事求是,由史出论。将这种文风推崇到极致,往往会漠视事实,蔑视证据,甚至歪曲事实,伪造证据,这就会造成社会科学研究的严重危机。

中国的社会科学来源于西方。中国自古虽有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法律学等思想,但并无独立的学科建制。主讲京师大学堂的陈黻宸在比较中西学术时说:“夫彼族之所以强且智者亦以人各有学,学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毕贯,一事之具,颠末必详。而我国固非无学也,然乃古古相承,迁流失实,一切但存形式,人鲜折衷,故有学而往往不能成科。即列而为科矣,亦但有科之名而究无科之义。”(《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收入《陈黻宸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675页)钱穆则说:“盖自道咸以来,内忧外患,纷起迭乘,国人思变心切,旧学日遭怀疑,群盼西化能资拯救。”西方的社会科学在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的大学中取得学科建制,从此在中国生根发芽。中国的社会科学,由于从西方移植过来,又加上钱穆所说的“群盼西化”之心理,因而长期仰仗于西方的理论与方法。1932年出版的《独立评论》杂志第31号上,署名燕客的

作者曾这样抨击中国的社会科学：“所谓社会科学，老实不客气的说，是西洋的产物。因为一直到现在，在中国所讲授的与所鼓吹的社会科学便都是些舶来品。”燕客指出：“因为近代的社会科学本来不是中国的，所以这几十年来中国一切属于社会科学的教科书与著作，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贩卖洋货。所谓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工作不外下列三种：一、讲授外国的教科书，二、抄袭外国的著作变成教科书或讲义，三、将外国书译成汉文。所谓中国社会科学大概也都脱不了这个窠臼……年复一年的各大学的社会科学教授们，将他们在少年所贩来的洋货，零售给一般恭顺的，专喜欢洋货的学生们，造出一批一批的一知半解欧美而不认识中国社会的毕业生。结果，每年的毕业生许多都没有出路；就是有出路的，也与他所学的不发生关系，不能用其所学以处置实际的社会。”

燕生所抨击的这种现象，其实不仅在20世纪上半叶存在，在20世纪下半叶也并无多大改观。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一直唯西方马首是瞻，模仿或借鉴西方的理论资源。西方的理论资源主要有两类，一是所谓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一是所谓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由于模仿或借鉴，在文风上，也就留下了教条主义和食洋不化的弊端。

相信读者对于“劣币驱逐良币”这一定律不会陌生。在学术研究的文风较量中，这一定律也是适用的。显然，脱离实际、言之无物的空谈张口可出，而要获得经世致用的真知灼见则需要付出很大努力。抄袭西方的见解很容易，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得出观点则很难。换言之，好文风付出的成本较大，坏文风付出的成本较小，好文风往往斗不过坏文风，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但是，社会科学研究显然不能让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为此就需要时刻警惕文风问题。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各门学科自有其脉络。这里难以一概而论，但都与文风的反思有密切关系。换言之，百年社科史，也是一部文风反思史。

这里不妨重放一下历史的快镜头，看一看百年来社科文风的反思过程。

20世纪初期，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起步。起步阶段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宋学文风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的学界中人，喜欢谈理论，谈主义，谈革命，激进者甚至试图以西方的思想全盘更换中国固有的思想。这些议论自然有其高明之处，但这种高谈阔论的文风显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杂志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认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

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对于胡适的主张,学界曾有不同解读。但从文风角度看,这是对当时大谈理论、大谈主义的空疏文风的一次纠弹。胡适本人传承的是强调实证的汉学文风,对强调理论的宋学文风一直保持着警惕。胡适治学,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但落脚点还在于小心求证。胡适的学生罗尔纲曾在报纸上发表题为《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的文章,胡适写信给罗尔纲批评文章立论不足,并说:“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句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以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胡适的这些主张,对于纠正当时高谈阔论、游谈无根的文风起过一定的作用。

1921年,梁启超出版《清代学术概论》,在这本著作中,梁启超表彰了清代学术,特别是清代正统派的学术,认为“永足为我辈程式者也”。梁启超归纳出清代正统派的十条学风: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正则弃之。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十、文体贵朴实简絮,最忌言有枝叶。这十条学风,正是汉学文风。梁启超认为,“用此种研究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得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梁启超自己并非正统派,他受康有为今文经学影响颇深,而“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梁启超走的是宋学文风的路子,以宣传新思想为己任,但在这本著作中,梁启超对自己也有所反思,认为“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

4 梁启超的反躬自省,表明当时已经有学者意识到宋学文风存在的风险。

1932年,蒋廷黻在《独立评论》29号上发表《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对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的东西化倾向进行了批判:“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他们的历史是值得研究的,必须研究的,而且可以研究的。……他们看见英美各国的大学有些什么社会科学的课程,也就照样设立这些课程。……学市政的或者知道纽约、巴黎的市政,但北平、汉口、成都的市政十之八九是不知道的。学‘政制’的都学过英美德法的政制;好一点的连苏俄、意大利、日本的政制也学过,但中国的政制呢?大多数没有学过,就是学过,也就是马马虎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学政治思想的,那一定上自柏拉图,下至拉斯基,都听过一遍;好一点的,还对于某派某家下过专门的研究。至于中国的政治思想,普通不过看了梁任公的讲演集。学经济思想的,学银行币值的,学会计的,学经济史的,学社会史的,学民俗的,那一个不是这样?我们的大学不是在这里为中国造人才,反在这里为英美法造人才。”

蒋廷黻曾留学美国,但他知道,要提高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必须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科学有一大半是由海外留学生建立起来的。蒋廷黻对西化倾向的反思和批评,标志着这一群体已经意识到西化倾向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伤害。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讲。毛泽东列举了党八股的八条罪状,一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二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三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四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五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六是“不負責任,到处害人”,七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八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毛泽东认为,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毛泽东还说:“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如果说蒋廷黻主要是批判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抄袭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毛泽东则是批判对马列主义的照抄照搬。中国的马列主义阵营是除海外留学生之外的又一大社会科学研究群体。毛泽东对党八股文风的批评,表明这一群体对社科研文风有了清醒自觉的认识。

1949年至1966年期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学、政治学被定性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遭到强行取缔,经济学和法学也受

到阉割,只能讲苏联教条的马列主义观点。与此同时,讲究实证的汉学文风受到批判。在1950年代的批判胡适运动中,大陆学界连带批判了胡适所提倡的实证文风,认为胡适所提倡的实证文风是一种主观唯心论的反科学的方法。旧的党八股在1949年之前曾遭到毛泽东的批判,但1949年之后,新的党八股再度兴起。社会科学研究在指导思想上陷入了新的迷信和教条主义。用新的教条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又出现了严重的文风恶化倾向。人们在“厚今薄古”的旗帜下,用“以论带史”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只重视观点的革命性,而不重视证据和证明,甚至可以“革命需要”“现实需要”为借口,歪曲证据、伪造证据。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因此陷入一片萧条。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社会学、政治学等“资产阶级伪科学”在中国大学中重新建立学科体制,经济学、法学等学科也重获生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文风也有所好转。鉴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上纲上线、伪造证据、不根据事实进行推论等不良学风遭到摒弃和申讨。但是,由于继之而来的仍是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时代,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依然是宋学文风当道,学界推崇的是“当代性”、“主体性”和“片面性”。应该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由于“左”的教条主义思想使人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确实需要更新思想观念,加强当代性与主体性,不必顾及全面性。但是,真理往前再走一步,往往就成谬误,对当代性、主体性和片面性的过度提倡,让人误以为头脑中只要有了新观点,哪怕是非常片面的观点,把它表述出来就是搞研究,至于这些观点是否实事求是,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证明,那是不用理会的。这就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进入1990年代,学术界检讨1980年代学术研究的“趋新惊奇,放言空谈”,将之归咎于文风的“浮躁”与“空疏”,于是有了提倡学术规范的呼声,各种学术刊物对学术论文大都提出了明确的规范化要求,比如,要求文章开头进行文献综述,回顾问题的研究状况,所有引文一律注明出处,具体到版本和页码。这些规范化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学术上的抄袭,培养作者讲究证据的习惯,使学术研究变得更为严谨。不过,由于整个学术大势仍是重视理论,对学术规范的提倡,反而造成了新的学术形式主义。不少社科文章通篇充满繁琐的注释,充斥着精致而晦涩的概念,表面上很有学理,高深莫测,但细看下去,大都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演绎,且基本上是照搬西方理论家的观点,西方理论家的观点在这些文章中,既是论证的出发点,又是论证的结论,所谓的“新见”,不过是拾人牙慧。这种情况表明,这些文章其实既未得宋学文风之精髓,也未得汉学文风之真传。因为宋学文

风重视思想和见解,但强调论必己出;汉学文风重视证据和证明,但反对循环论证。进入21世纪,学界中人对上世纪90年代的文风又有反思,2010年有《岭南宣言》发表,认为当前文风积弊深重,一曰以艰深文饰浅陋;二曰以抄袭冒充研究;三曰以繁琐支撑空洞;四曰以模式扼杀创造;五曰以矫情代替真情,以低俗排挤高尚,由此提出新的文风号召:“提倡经世致用,反对脱离实际;提倡真知灼见,反对言之无物;提倡真情实感,反对矫情滥情;提倡简洁明快,反对艰深繁琐;提倡自我创造,反对因袭模仿。”

以上我们回顾了百年来学界对社科文风的反思与批评过程。百年来的社科学风,曾经走过弯路,但由于有反思与批评的存在,不良文风也曾得到过校正,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这些优秀成果,既有新奇的见解,又有充分的论证,既有全球的视野,又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了宋学文风的优势,但也结合了汉学文风的长处。

本书从这些优秀成果中,再挑选出30余篇文章,希望树立榜样,扶正祛邪,推动良好文风的复归与发展。

本书所挑选的这30余篇文章,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一类是独抒己见,有自己的理论发现与创造。比如何永佶的文章发明了“天下国”和“地缘国家”两个概念,用这两个概念,清晰而准确地解释了中国国际关系格局的症结问题。费孝通的文章用“血缘社会”和“地缘社会”两个概念,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将其观点置于梅因、涂尔干、滕尼斯等西方社会学大师之列,也毫不逊色。吴景超把中国农村分为“绍兴型”和“宁波型”两种类型,建立了一个农村社会学的理论模型。胡焕庸研究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发现了一条人口分布线,这条线后来被国际上命名为“胡焕庸线”。贺麟把法治分为三种类型,区分了三种类型的知识基础,界定了三种类型的各自特征。这些文章都有新奇而高超的见解,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创造能力。而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汉学文风的影响,何永佶和费孝通的文章建立在中外历史了如指掌的基础之上,吴景超的文章来源于对中国农村的实地调查研究,胡焕庸的文章则是老老实实在地以数据来说话。

第二类,虽未形成理论性的认识,但也有高明的见解,而这些见解又是从中国社会事实中归纳总结出来的。如梁启超的文章梳理50年来中国社会思想的变化轨迹,提出了著名的三阶段论。何炳松从亲身的教育实践中,发现了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三道围墙”。蒋梦麟用具体到身边的事例,揭示了中国的“陋规制

度”。林同济用“中饱集团”命名中国的官僚集团,言简意赅又形象生动,深刻揭示了官僚集团的性质和恶行。顾准的文章探讨了“为什么中国没有成长出资本主义”这一问题,在文化大革命的极端封闭语境中,得出了与社会学大师韦伯类似的观点。何新的文章发现了社会精英“逆淘汰”的现象。朱苏力从法学的角度审视婚姻、离婚和“小三”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观点。吴思试图重新理解迷信,用具体的事例,阐发了迷信的正面功能。秦晖的文章重新讨论了农民的定义,在农民、市民、传统、现代等问题上提出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郑也夫对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特别是谈到妇女解放运动产生的弊端,发人深思。

第三类,深入浅出地解释了社会中某些“常识”背后的原理。对于习以为常的事物,人们往往容易丧失追根刨底的探究兴趣,但“世事洞明皆学问”。能把“世事”存在的道理和运行的机制讲明白,就是学问。李树青的文章,用“社会的阶梯”这个比喻,生动地阐明了“人往高处走”的道理。全慰天的文章解释了“家天下”的由来和原理。杨懋春的文章,生动地阐述了自发生成的农村社会的存在合理性和必然性,揭示了其正面功能。丁学良对传统格言“棍棒底下出孝子”进行了重新解释,也有一定道理。樊纲的文章谈政府的职能,将高深的道理讲得平白如话,经作者分析,人们会发现,原来日常生活中的路灯、邻居吵架、街上的警察等等现象背后都大有学问。葛剑雄的文章,论述了移民对国家、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增进了人们对移民作用的认识。

第四类,澄清了人们的某些模糊性认识或误解。如王星拱阐述了中国必须“以工立国”的道理,反驳了“以农立国”的主张。冯友兰的文章,运用本质性的思维和辩证性的思维,揭示了“现代化”的本质,阐述了工业化的重要性。吴世昌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对传统文化保持温情和敬意的读者难免会心生不快,但面对吴世昌所罗列的证据,大概也无话可辩。张五常的文章犀利地提出“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明快地阐述了市场经济的原理,强烈地冲击了人们对计划经济的理解。王则柯的经济学随笔,澄清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宣传性的见解,重新解释了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经济学现象。崔之元的文章,阐发经济民主的重要性,澄清了人们对于“经济民主”的诸多误解。端木正论述了法律必须“一刀切”的道理,驳斥了人们对“一刀切”思维方式的批评。汪丁丁的文章,告诉人们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经济学不能不讲伦理。王绍光的文章,抓住政府最感兴趣的财政动员能力这个问题,通过摆事实、讲历史,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民主